

亦似有道家之影响,为进一步理解先秦儒家思想演变及儒道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

思想史(包括哲学史)方面研究文章甚众,只能有选择的简略介绍,详情请参看介绍思想史研究动态的专文。通论性文章有刘宝才《〈唐虞之道〉的历史与理念——兼论战国中期的禅让思潮》(《人文杂志》3期),王定璋《〈尚书〉中的裕民思想》(《社会科学研究》4期),黄琳斌《试论〈左传〉的崇霸思想》(《江西社会科学》9期),刘丽文《论〈左传〉“天德合一”的天命观——〈左传〉预言的本质》(《求是学刊》5期),陈采勤、朱晓红《论先秦诸子的抗灾赈济措施》(《史学月刊》3期)等。

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文章有李冬君《先秦诸子论孔子与孔子的圣化》(《南开学报》1期)、沈长云《论孔子对周公“德”、“礼”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河北师大学报》2期)、汤勤福《试析孔子道德人格学说的主要范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4期)、靳风林《论孔子的死亡观》(《北方论丛》1期)、朱松美《荀子安民观论议》(《东岳论丛》5期)、罗新慧《曾子礼学思想初探》(《史学月刊》3期)与《曾子生平考析》(《学术月刊》2期)、邓新文《孟子学问之道发微》(《浙江学刊》2期)等。

道家思想研究方面,陈鼓应《先秦道家之礼观》(台北《汉学研究》第十八卷第一期)分别考察了道家老、庄、黄老三派之礼观,提出有别于传统认为道家反礼的传统看法。此外尚有王萍《老子与中国早期史官》(《文史哲》2期)、翁银陶《“道”:“绝对虚空”与“宇宙密码”的混入——对老子宇宙本体论的思考》(《中州学刊》2期)等。

研究诸子的文章还有李继耐与张希宇《论墨子的军事防御思想》(《文史哲》3期)、杨建祥《〈管子〉天人关怀中的持满思想辨析》(《东岳论丛》2期)、罗世烈《韩非的伦理思想》(《中华文化论坛》2期)、赵玉洁《谈韩非对儒家学说的吸收与改造》(《河北大学学报》6期)等。

综上所述,2000年度西周春秋战国史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年代学和郭店楚简上,先周文化也吸引了许多注意力,学者对西周、春秋的制度、礼俗仍保持有浓厚兴趣。学术界开始对西周、春秋社会形态进行反思和再认识。有理由相信,在未来几年里,对这一阶段历史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会进一步加大,学者取得的成绩也会更多。

近二十年来有关明清“奢靡”之风研究述评

钞晓鸿

(厦门大学历史系 福建厦门 361005)

近20年来,学术界围绕明清时期所谓“奢靡”(或谓“奢华”、“侈靡”等等)之风的研究相当突出,除了部分论著专门探讨外(如牛建强、王卫平的博士学位论文分别以该时期社会风尚为研究的主题或主要问题之一),更多的相关论著对此也有涉及。

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对奢靡之风的讨论并不限于明清两代,但以对该时期的讨论最为集中。清朝灭亡是20世纪的事,但由于本文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回顾,故也遵从研究习惯,大致以鸦片战争为下限。另外,境外学者对此问题也有研究,囿于涉猎所及,本文仅以大陆为限。

一、关于“奢靡”的概念及其使用

有的研究者将高消费与“奢靡”之风相联系,甚至是等同于“奢靡”,如朱子彦、张洁明对明清乌青镇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的研究(《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这大概与人们的通常认识有关。有人总结说,在个人消费问题上,人们习惯于把不断提高消费水平等同为奢侈浪费,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特征(黄焕山:《关于消费问题的几点认识》,《复旦学报》1985年第1期)。有的则强调其享受的一面。陈茂山认为,在明代中后期盛行奢侈之风的情况下,人们不是履行节俭,而是要求现世享乐;不是满足糊口度日,而是追求物质享受。他将社会风气的转变分为奢侈之风与僭越之风等几个方面来论述,显然前者主要是就消费与享受方面而言(《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王卫平也认为,明清苏州存在着“追求享受的奢靡风气”,“追求物质享受的奢靡”之风盛行(《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嬗变研究之二》,《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常建华把奢侈与逾制作为对等的概念,他认为追逐时髦和违礼逾制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奢侈为基础的,奢侈则往往导致违礼逾制和追逐时髦(《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

有的学者认为高消费与奢侈有别,后者只是高消费的表现形式之一。如王家范在《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华东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一文中说,在明清江南高消费结构中,政治性与奢侈性的消费比重畸高,说明高消费仍具有传统的贵族奢侈消费性。可见,奢侈性消费只是高消费之一。陈学文在《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在陆揖的观念中,“奢”已不是一般的追求狗马声色的奢侈享受,而是正当的高消费,消费水平高,不是泛指奢侈或奢靡的意思。

有的学者对此类现象亦有研究,但没用“奢侈”等词,而是说某些人消费欲膨胀、对商品的追求出现了高、精、尖的趋向,并论说明代江南园林之盛与官场的吃喝风(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有人对明代最具典型性的统治集团消费进行探讨,认为这类消费恶性膨胀、具有原始性与腐朽性(唐文基:《试论明代统治集团的消费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有的则强调其反对或维护封建礼法与等级的一面。姜旭朝、万安培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顽固派把下层等级违犯生活消费方面的等级标准来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言行斥为奢、僭越,以奢俭作为贫富的根源来训劝贫民安贫、富人保富(《近代中国关于奢俭问题的论争及其历史经验》,《东岳论丛》1986年第1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中,也包括有关奢侈的内容(《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这种认识在文化史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有关明清时期“奢靡”之风的研究中,具体、明确探讨“奢靡”一词概念者十分罕见。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一书认为,大体上中国古代奢侈的划分有二种基本标准,一是是否超越自身等级的标准,二是消费品对主体是否绝对需要。

二、关于“奢靡”之风的时间范围

相关的论著集中讨论了三个时期,一是明代中、后期。例如,汤纲、南炳文认为,明代中后期,奢侈风气越来越严重,日甚一日(《明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31—532页)。吴仁安认为“晚明”时江南人日益追求奢侈(《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王兴亚指出,从明代中叶开始,社会风尚侈奢相高(《明代中后期河南社会风尚的变化》,《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

二是明清时期。如朱子彦、张洁明关于明清乌青镇的研究(《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王新考察了明中叶以后直到清前期社会风尚的变化(《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变革举隅》,《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3期)。王家范指出,大约从明中叶开始,关于江南社会风气趋向奢靡的议论日见激烈,经顺治朝的低谷,大致至康熙前期,故态复萌(《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华东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王卫平也认为,奢靡之风滥觞于明代中期,明末趋盛,清初收敛,随之而愈来愈烈(《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嬗变研究之二》,《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

三是专门讨论清朝。如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等等。

而一些研究者对“奢靡”之风的出现时间及其演变进行了具体考察。常建华指出,大量资料表明,明代以衣食住行用为主的生活消费风俗的变化,大致起始于成化之后,发展于嘉靖以降。如明代饮食风俗由俭入奢的变化过程,就是始于成化以后(《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吴存存认为,到正德年间,社会上各种奢侈俗开始形成(《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而另一些人认为从正德、嘉靖年间开始,全国范围内盛行一股奢侈之风(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晚明社会的奢靡风气大致起于正、嘉以降,此前虽有骄奢之例,但从整个社会而言,尚未形成挥财斗奢的风气,仍以淳朴为本色(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明史研究》第三辑,黄山书社,1993年)。嘉靖、万历时期,奢侈成为社会风尚(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第349页)。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是社会风尚的大转变时期,嘉靖以前还比较淳朴,隆庆,尤其是万历以后,则日趋奢侈(陈学文:《明中叶“奢能致富”的经济思想》,《浙江学刊》1984年第4期)。与以上使用中国传统的年号纪年作为区分标志不同,有的研究者以公元纪年的形式作为划分界限,其中刘志琴认为,明人风尚的显著变化,大致起于16世纪20年代即嘉靖初期,盛于16世纪末即万历中叶,止于明亡,历时一百余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王翔认为出现在16世纪以后(《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而牛建强认为,

以苏州府、松江府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从15世纪50年代开始先期发生变化,早于其他地区约70年的时间(《明代江南地区的早期社会变迁》,《东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3期)。

王家范指出,从明中叶开始的江南社会奢靡风气,大致至康熙前期,故态复萌(《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华东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李景屏根据原始资料指出,清朝人认为本朝奢靡之风的出现,始于康熙中叶以前(《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而张仁善认为是从乾隆中期开始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与以上论著明确划分时期的意见相反,有人主张对此应作模糊化处理。如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刍议》一文认为:不同地区,奢侈浮靡风气出现有先后与程度之别,即使同一地区也因人而异。人们一般所说的正德、嘉靖前后俭奢之别,是就程度相对而言的,事实上没有一条如此清晰的分水岭(《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三、关于“奢靡”之风的波及范围

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大致从以下三个视角展开:第一种主要从地域上来区分。一种意见认为存在于部分城镇地区。刘志琴认为晚明社会风气的变化是不平衡的,“讲究奢华的风气”主要表现在商业繁荣、消费人口集中的江南和沿海城市,广大农村仍然沿着世代相沿的传统生活方式,保持淳朴俭约的田园风光(《晚明时尚与社会变革的曙光》,《文史知识》1987年第1期;《晚明城市风尚初探》,《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在地域方面,学术界的讨论集中于江南地区,有不少论文对此进行了探讨。但即使就江南而言,有人认为也局限于少数城镇,江南农村在自然经济包围之中,城市风尚无法扩展(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故而有的文章即专门讨论江南城镇,如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其他地区包括内陆地区,社会风尚也由俭朴向奢侈转化,河南就是其中一例(王兴亚:《明代中后期河南社会风尚的变化》,《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进而有文章认为,奢靡之风蔓延全国,例如陈学文《明中叶“奢能致富”的经济思想》(《浙江学刊》1984年第4期)一文即持如是看法。

第二种主要以阶级或阶层来区分。与上述地域讨论中城镇观相对应,一些文章是专门针对市民或城市中的部分人。如王翔的《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有人甚至认为奢靡之风在整个市民阶层弥漫开来(高建立:《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与社会风习的转变》,《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而刘志琴在《商人资本与晚明社会》(《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一文中说,城市富有者享用奢侈品不断增长,在城市中谋食的众多劳动人民,生活在最低水平线上。张民服认为奢侈品只是皇室贵族、官僚地主和富商大贾的专用品,广大下层人民根本没有能力享受奢侈品(《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王春瑜也指出达官富室等消费幅度增长惊人(《明代商业文化初探》,《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一些人则专门论述商人,部分商人生活奢靡,甚至说盐商是吸血鬼(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人和社会风尚》,《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年)。而与人们一向认为徽州盐商生活豪华,商业利润都花在奢靡上的观点不同,汪士信强调封建政府、官僚的剥盘与压榨。他认为即使以需钱最多的构筑园林一项,相对于徽商实得的利润,只占百分之三,是微不足道的(《乾隆时期徽商在两淮盐业经营中应得实得利润与流向试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暴鸿昌认为,晚明权贵富商穷奢极欲,乃至整个社会都标榜奢靡,崇尚侈丽,但它实际上是少数人对财富的吞噬、挥霍与浪费,是以更多人的贫困和饥寒为前提的(《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明史研究》第三辑,黄山书社,1993年)。

第三种以地域结合阶级或阶层来区分。一类意见认为这种风气仅存在于部分“点”上。汤纲、南炳文认为富商大贾挥金如土,地主阶级奢侈腐化,明代中后期的奢侈豪华风气越来越厉害,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尤为突出(《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牛建强、汪维真认为明代中后期全国各地的社会风尚均发生了程度不等的变化,以苏松为代表的江南地区最为典型,而江南周边地区也发生了社会风尚的更新。就某一地域而言,奢侈之风起初存在于城市,后传至城郊,由城市衣冠之家而至城市一般市民,然后再至“城郊”农民(《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史学月刊》1990年5期)。王家范认为明清江南城市的高消费以奢侈品消费为大宗,与乡村的低消费形成强烈的反差。若以该地区消费的主体来划分,可分为贫困型、小康型与豪奢型三种(《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

另一类意见是承认其普遍性。奢侈的高消费从宫廷、贵族、官僚蔓延到庶民身份的地主、商人以至一般贫民(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奢侈之风遍及城乡,包括各个阶层,社会各阶层普遍参与是明清时期太湖地区奢侈之风的特点之一(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嬗变研究之二》,《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奢侈风气及其评价——吴地民风的嬗变研究之四》,《学术月刊》1994年第2期)。整个社会到处都弥漫着奢靡之风(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刍议》,《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不仅有权有钱者追求奢靡,小民奴仆也参与其中,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地区或多或少有所表现,就是僻远的农村也是如此(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仁善认为在清代中期以后,反礼法趋势南北城乡各地均有,具有普遍性;包括贫富贵贱,具有超越阶层性;包含物质与精神领域,具有并发性(《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不过一些研究者更加突出奢华在不同方面所表现出的趋同性与差异性。如冯尔康、常建华认为劳动群众多是低消费,一般家庭的住宅很简陋,他们的奢华只是表现在某些方面,在婚丧嫁娶中,从富贵之家到穷苦民众,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区,日趋奢华,铺张之风甚盛(《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嘉靖时期,饮食的奢靡之风吹遍了大江南北,带有全民性,明代中后期全国各地不同阶层都卷入了奢侈之风(常建华:《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钞晓鸿认为,就“陕西商人”所谓的奢靡问题而言,他们之中并非没有衣食节俭之辈,但应该承认相对的豪华生活是陕商群体的一般特征,其在婚嫁丧娶方面的某些形式与内容也会波及普通百姓(《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张炳

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而更多的人则比较突出奢华在不同地域所表现出的差异性。如李景屏认为,清代奢靡之风波及社会各阶层,具有普遍性,但也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南北、城乡之间存在着差异,东南沿海的大中城市最先受到奢风的影响,江南奢华甲天下(《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四、关于“奢靡”之风的表现

一般文章都列述了奢靡之风中的几个方面,但只是以此作为分析素材而非论述主题,惟详略多寡不一,大致可以将其归纳为:

穿着服饰,包括衣着款式、质地、花色及其装饰物。

饮食餐用,包括一般餐饮及宴客招待,涉及餐饮用具、原料、花样及消耗量。

宅第等建筑及其装饰、陈设物,如官私房舍等的材料、建筑风格及其规制规格。

交通及代步工具的使用。

寿诞婚娶、祭祀丧葬。在名目、花销、程序、仪式及陪嫁妆奁、丧具营葬等方面。

迎神赛会,节日庆典等活动。

游乐及其设施。

寻欢作乐、陋习与恶习,如赌博、吸食鸦片及纳妾宿妓等。

另一些文章则集中探讨了其中的某个方面。如王卫平分析了太湖地区的赌博现象(《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吴存存研究了明清社会性爱风气,认为这也是奢侈纵欲风气表现之一(《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还有一些文章加入了人情世态、思想观念的更新与变化,如择偶、择业观念,上下、长幼、贵贱、尊卑观念等等。

五、关于“奢靡”之风的成因

学者们一般在学理上都承认“奢靡”之风形成原因的多样性与多重性。刘志琴认为晚明时尚变化的原因是空前的礼制败坏,而礼制败坏的原因又包括经济恢复、生活提高、欲望膨胀、官僚腐化、法制松弛等诱因。她认为一代风尚的形成,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代的文化现象,是经济、政治、心理、习惯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表现(《晚明时尚与社会变革的曙光》,《文史知识》1987年第1期)。冯尔康、常建华认为,生活方式的形成与状态同等级制度、重本抑末、封建伦理、迷信意识密切相关,个人本身的性别、年龄及职业,所处的地理环境,也影响着生活方式的选择,但最基本的还是小农生产水平、封建的社会制度和意识(《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央政权机制的紊乱,绅士群体的变化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导致了明代消费风俗的变迁(常建华:《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

但是,学者们在具体分析时各自却存在着不同的侧重面。一些人着重从经济特别是商品

经济来分析。欧阳卫民认为影响消费心理和风气因素很多,如个人收入、生理变化、文化素质、价值观念、社会生产力、经济和自然环境、消费关系与家庭关系等等,但收入是决定性因素(《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刘含若认为“崇奢”的基础是商业资本的积累(《中国古代消费思想评述》,《经济问题》1986年第11期)。王新认为社会风尚的变化不仅仅是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单一因素所致,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以前者为分析重心,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金钱的万能,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与社会心理有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僭礼越制、去朴从艳、去俭求奢、追奇求异等新现象(《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变革举隅》,《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3期)。许多学者是从商品经济的角度来分析的。如牛建强、汪维真认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是商品货币经济日益强盛的必然逻辑,并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将明代中后期风尚取向的变化分为三个等差及类型(《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史学月刊》1990年第5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周围地区风尚取向的改变及其特征》,《东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王兴亚认为社会生活的诸多变化从根本上说是取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中后期河南社会风尚的变化》,《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张民服则从商品经济具体分析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陈学文指出,明中叶商品经济发展,万历时财政储蓄增多,社会风尚趋向奢侈(《明中叶“奢能致富”的经济思想》,《浙江学刊》1984年第4期)。宋传银则更直接指出,清代的奢靡之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直接产物,是清代社会政权失控的结果,吏治败坏加剧了奢风的盛行(《论清前期“奢靡”之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一些人的看法与此相反,认为对经济方面的促成作用不宜估计过高,弱化经济原因而强调其他方面的作用。蓝东兴认为,明中后期社会经济较前有很大发展,社会物质财富大增,这只是为奢靡提供条件,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而是在人们的生存需要等受到满足后,对享受与发展没有正确认识,统治者没有正确引导所致。奢侈浮靡之风激发了政治腐败,而政治腐败又促进了奢侈浮靡(《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刍议》,《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李景屏对清代的分析认为,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社会财富的积累为康熙时期社会风气的转变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奢靡风气的形成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关键在于封建制度使得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很难用于扩大再生产,其中绝大部分流向消费领域;另外,社会观念的变化对社会风气由俭入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一些学者重视从制度方面来分析。周绍泉从经济制度方面分析明代服饰变化。他认为服饰中的变化不仅随朝代的更迭而变化,即使一代之中,亦随着政治经济发展而变化,在明代中叶后,纲纪废弛,法网疏阔,竞尚奢华,同时明代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服饰的演变也起着巨大的作用,进而将明代服饰越制与赋役制度的演变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明人服饰探论》,《史学月刊》1990年第6期)。还有人从政治制度方面进行分析。暴鸿昌认为,晚明奢靡风气乃社会财富集中所致,究其根源,则又是明代政治腐败的产物(《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明史研究》第三辑,黄山书社,1993年)。王家范更强调政治制度的作用,认为在传统社会中,这种奢侈性高消费能力尽管与广占田产有关,但政治一体化的传统社会结构,政治权力强有力地统治着经济,所有的收入无法支撑无限度的豪奢性高消费,其更重要的经济后盾是依赖于政治性的官僚

俸禄与巨额的法外收入,所有奢侈性高消费无不靠政治权力的支撑(《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

一些人注意从心理与思想等方面来分析。王卫平认为赌博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也有其心理基础(《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冯尔康、常建华认为,婚丧方面的奢侈与人们的虚荣攀比心理有密切关系(《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吴存存认为明代纵欲风气的形成,原因复杂,除经济发展、和平岁月以外,对于晚明的士人来说,最直接的原因是来自思想界的阳明心学(《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还有一些人注重具体分析,强调其时空特殊性与具体因素。吴仁安认为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变化的基础是社会经济力量的增长,而始作俑者是缙绅士大夫(《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张仁善认为,统治者首开奢靡,形成诱导之势(《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有的论著认为,嘉靖、万历时期商品经济的发达,大大刺激了社会的消费能力,奢侈成为风尚,上层求胜竞富,下层群起效尤,奢侈的高消费从特权阶层的皇室、贵族官僚蔓延到庶民身份的地主、商人以至于普通百姓(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王振忠指出,明代中叶中国社会风尚的剧烈变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这只是笼统的说法,从扬州盐商社区文化的角度分析,其更具体更直接的原因是,成化、弘治年间东南盐政制度的重大改革,使得大批盐商汇集淮、浙(《明清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暴鸿昌认为,富豪开其端,名宦导其势(《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明史研究》第三辑,黄山书社,1993年)。钞晓鸿认为,关中奢靡之风的具体成因,与区域环境、攀比心理以及士商的诱导密切相关,也受到外地如江南生活方式的影响(《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李景屏认为,奢靡之风之流在官民,其源在最高当权者,可谓是上行下效(《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六、对“奢靡”之风的评价

学者们围绕着各自所研究的问题进行探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了对所谓“奢靡”之风的评价,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些人明显持肯定态度。刘志琴认为,晚明奢侈中虽存在华而不实,繁荣中虽有假象,但却迸发出新旧时代交替前朦胧的曙光(《晚明城市风尚初探》,《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晚明时尚与社会变革的曙光》,《文史知识》1987年第1期)。吴仁安也认为明代社会风尚的这一变化代表着“新社会的曙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王翔认为扩大了生产与商品流通,增加就业,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生活的态度,是对封建礼制和等级制度的反叛,预示着社会变革风暴即将来临(《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苏州大学

学报》1993年第3期)。王卫平批评有些学者强调奢侈风气的消极因素,如延缓了资本主义萌芽,败坏社会风气,助长了虚荣心等等,他认为,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奢侈之风解决了城市人口就业,冲击了封建伦理与等级观念,推动了商品经济,为资本主义萌芽创造了前提,刺激了手工艺进步与特色产品的产生(《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奢侈风气及其评价——吴地民风的嬗变研究之四》,《学术月刊》1994年第2期)。高建立指出,晚明人对衣食住行的奢侈要求,反映了人们自然本性的原始冲动,也是人们对人生价值的重新认定和把握,是对理学家禁欲主义的批判与唾弃,反映了晚明市民阶层的觉醒(《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与社会风习的转变》,《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

一些人对奢靡之风虽有一定的看法,但总体上是肯定的。这些豪华、奢侈、放荡和“机巧的社会风尚”正在吞噬着旧有的封建道德,腐蚀着封建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旧有的封建秩序(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业——读清人笔记札记之一》,《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社会风尚的这种变化同时蕴含着进步与黑暗,守旧与更新,但总体上孕育着近代文明的曙光(王新:《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变革举隅》,《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3期)。清代前期民间的奢靡之风,虽然伴随着一些落后、腐朽的因素,如及时行乐的消费观念等,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但却意味着对封建礼制的反叛,传统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变异,表明封建社会正在走向自己的坟墓(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清代中期以后的反礼法趋势给人们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以及精神风貌带来一系列新变化,如新型的商业精神开始萌芽,权力至上的观念开始动摇,传统的伦理关系受到冲击,震撼了国家政治关系的基础,文化娱乐充满生机,从中可以看到社会大变动的曙光,是中国步入近代化的内部动因,加速了封建制度的消亡(不过农村例外)(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一些人承认其积极作用,但总体上是是否定的。陈茂山认为,从正、嘉年间开始在全国盛行的奢侈之风,尽管有新气象、新趋向,但存在明显弊端与缺陷,规模空前的奢侈之风,造成社会的贫困和混乱,是明亡与资本主义中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王春瑜指出,明代商业文化冲击了“重农抑商”观念、封建礼教与等级,但从总体上看,是低水平的商业文化,隐藏着不容忽视的虚假性,一方面,食品、服装等占主导地位,生产、流通领域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很有限,另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商业文化沾染了流氓意识。含有近代文明色彩的良辰美景,根本没有出现,当时并没有也不可能越出传统的樊篱(《明代商业文化初探》,《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

一些人则同时指出正负面影响,既有肯定也有否定。冯尔康、常建华认为,在一定意义上,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为社会变革提供直接动力,但清人生活上的浪费和奢侈追求,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常建华在分析明代后又认为,当时消费风俗的变化体现着一定的社会进步性,体现出新的消费意识,对传统农业社会注入活力,冲击了等级制度与人伦道德,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伤风败俗的性质,体现着封建政治的腐朽性,是进步性与腐朽性的结合与统一,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都是明朝政权的破坏力量(《论明代社会生活消费风俗的变迁》,《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张民服认为

奢侈消费与奢侈品产销促进了传统思想和传统观念的转变,对封建伦理道德起了一定的分解作用,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却诱发了人们的消费欲望,生活由俭变奢,重财重利,加之封建制度所致,大量的财富集中到统治阶级手中,主要用于奢侈性消费,奢侈品在生产与交换中的地位突出,没有用于社会再生产,未能成为瓦解封建政治、经济体制的经济力量(《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欧阳卫民对中国历史上的黜奢崇俭思想进行了总体评价,他认为,黜奢崇俭有助于经济稳定,而有害于经济发展:是经济的稳压器,而不是加速器,维护了小农经济,却阻碍了商品经济;消极作用会随着国民经济走向现代而越来越大。同时他也认为节俭精神永存,是中国消费思想生命力之所在(《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李景屏认为,清代前期的奢靡之风不仅吞噬了大量宝贵的社会财富,也败坏了社会风气,但“僭越”之举客观上改变了“贱不得逾贵,小不得加大”的制约,构成清代奢靡之风最鲜明的时代特征(《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胡一雅认为,奢靡之风造成生产停滞,社会发展迟缓,但在当时的具体客观条件下,一些人物在宽裕的生活下,积极从事文化科技活动,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对于建筑、诗歌、戏曲等也有促进作用。既不利于社会发展的消极方面,也有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中国封建社会各等级等级的消费》,《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方行对中国地主制经济进行反思,他认为,封建地主的过度奢靡生活,浪费物质资源,败坏社会风气,引发社会矛盾,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地主消费这种有效需求,却可以通过市场推动生产的发展,特别有利于发展第三产业,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略论中国地主制经济》,《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一些人明显持否定态度。如萧国亮就对两淮盐商不与生产联系的消费持否定态度(《清代两淮盐商的奢侈性消费及其经济影响》,《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王家范认为,明清江南的消费相比较而言,存在着某些进步性,如消费主体扩大,推动了某些消费品的大众化。但从以奢侈品为大宗的高消费来分析,则无益于原有经济结构的突破,无法造就社会变革者,反而稳固了传统的政治结构,是一种病态的高消费,只能导致商品经济的虚假繁荣,无益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王振忠对扬州盐商社区文化的研究也认为,该地城市文化的兴盛,并无稳定的经济基础,也不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从本质而言,它只是商贾、士大夫穷奢极欲所形成的畸形繁荣(《明清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暴鸿昌认为这种奢靡之风看似带来了商业的盛况,奢侈性商业和服务业的发达,确实养活了不少人,甚至有人认为是对封建制度和礼法观念的冲击。但这只看到了奢侈后果的一个方面,未看到奢靡的全部危害及恶劣的社会后果。不管怎样,它是以更多人的贫困和饥寒为前提,是社会的虚假繁荣,社会上层的奢侈性消费,把更多的人引到奢侈品的生产和奢侈服务业上来。由于奢靡生活的需要和影响,不事任何生产的人越来越多,商业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这种奢侈品商业的发展,是畸形的商业繁荣(《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明史研究》第三辑,黄山书社,1993年)。蓝东兴认为明代的奢靡之风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恶果,表现在:人们的需要层次恶性膨胀,造成物质财富极大浪费,延缓了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社会经济发展走向畸形轨道,农业萎缩,手工业生产受到限制;社会的统一与协调遭到破坏,人性扭曲;助长了官场腐化(《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刍议》,《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与以上总体评价不同,一些人则进行了具体分析,尽管其中的某些论文并非是专论奢侈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在不同地区,后果不同,可谓是因地制宜。牛建强、汪维真对明代不同地区的分析认为,与在江南地区不同,在江南周围包括浙、闽、粤的一些地方,工商活动、日常生活、人情世态三者不能一致和谐,影响了商业资本的生产投入,涩滞了人情世态的深入变化,显现了新旧因素的共生与极度冲突(《明代中后期江南周围地区风尚取向的改变及其特征》,《东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张仁善认为农村与都市有别,由于广大农村处在自然经济之中,许多违背礼法的消费生活并非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为基础,而是属于封建的寄生的腐朽性浪费,无助于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另一种意见认为在不同时期,后果不同,可谓因时而异。如宋传银认为,清代前期民间的奢靡之风,从当时特定历史阶段来考察,无疑在社会生活领域渗透出一股清新之风(《论清前期“奢靡”之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再一种认为,时期与地区并重,应因时因地而进行评价。王卫平认为,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奢侈之风与传统社会的病态消费行为有别,是特定时期与地域出现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奢侈风气及其评价——吴地民风的嬗变研究之四》,《学术月刊》1994年第2期)。钞晓鸿认为,明清时期“陕西商人”的奢华生活,影响了商业资本应有作用的发挥,所以尽管以关中籍商人为主体的“陕西商人”名噪一时,但对关中经济的推动作用却是有限的(《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陕商主体关中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在各阶级、阶层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有论著指出,对财富的狂热追求和奢侈消费,本来只是上层官僚贵族和大地主的专利,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无积极意义可言。这种风气的下移,固然也存在妨碍积累的财富转化为资本的消极作用,但它的基本面则反映了商品经济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冲击和挑战(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

当然也有因事而异者。如王卫平对苏州社会风尚的系列研究认为:一般而言,明清时期当地风尚的各种变化为启蒙思潮的产生开辟了道路,但其中的赌博现象却危害社会(《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嬗变研究之二》,《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七、“奢靡”之风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由以上的回顾可以明显看到,在有关明清奢靡之风的研究中,学者们的分歧很多,有些意见甚至截然相反。但以上所引录的论著中对此却基本上无正面、直接的商榷与争论,大多是自我评说,个别的商榷也只是含混指出,并未指名道姓,针对某文某观点,从而给读者带来诸多不便,而且对推进学术发展不利。

二、基本上未对“奢侈”等概念予以讨论与界定,一般是按照自己心中的理解来分析研究的。尽管部分学者十分清楚古今奢侈概念大不相同,有的作者还以加引号的方式予以区别,但

多数论著至少从行文上流于将古今奢侈一词混用(一方面引用的原始资料中明确说明属于奢侈之列,一方面是研究者擅自将某些内容归纳于自己所认为的奢侈之属;另外,明清人谈到奢侈、奢俭问题时,实际上是就不同事项的,有时针对个人家庭、有时针对社会或某一阶级与阶层,还有时是针对国家财政)。这既影响了读者对这些成果基本思想的理解,又直接影响了各自对历史上“奢侈”的研究与评价。还有,其他的一些概念也需要澄清,例如奢靡是否等同于享用奢侈品,有奢侈现象是否等同于有奢靡之风。

三、诸多研究分歧的产生,与人们对资料的挖掘多寡、对明清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认识以及对某些理论、方法的掌握程度有直接关系。例如争论最多、最明显的明清“奢靡”之风对经济的推动或阻碍作用问题,笔者以为,对经济学理论的全面理解(如日本著名实业家、经济理论学家堤清二在其《消费社会批判》朱绍文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的《序言》中问答到:生产与消费是一对对等的概念,这种思想是不是在任何时代都被视为正当主张呢?恐怕只有在市场体制的生产方式和市场体制的消费方式范围之内,二者才能形成一对对等概念;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全面认识(如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庶民经济的力量大小、明清经济运行机制是由“经济”、“市场”左右还是由“权力”、“传统”左右等等)是解决纷争的关键。

四、各领域一般仅在所述范围内探讨“奢侈”。这一方面体现出学者们的扎实态度与严谨治学精神,实为推进学术发展所必须;但另一方面,随着成果的增多、研究的深入,也需要总结性、综合性的研讨与评估,因此对明清“奢靡”之风的全面研究势在必行。

以上仅就有关明清“奢靡”之风研究进行了简单综述,其中所存在的某些问题恐怕不仅仅存在于该课题研究。笔者不揣愚妄,斗胆直抒拙见,疏漏错谬定当难免,识者正之。

历史上的中国人口行为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余新忠

(南开大学历史系 天津 300071)

2001年5月21至22日,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和历史学院主办的“历史上的中国人口行为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开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苏州大学、《历史研究》编辑部、《光明日报》社、商务印书馆,以及美国加州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单位的2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中国是目前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对中国来说,具有无比的紧迫性。现今的这种人口格局,显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研究历史上的人口行为无疑对理解当今的人口现状,更好地制定人口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人口学的经典著作——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尽管诞生于两个世纪以前,但其阐发的一些基本原